



面对党在不同时期交办的任务

同一声回答
四代人

本报记者 吴懿 王春莹 孙亚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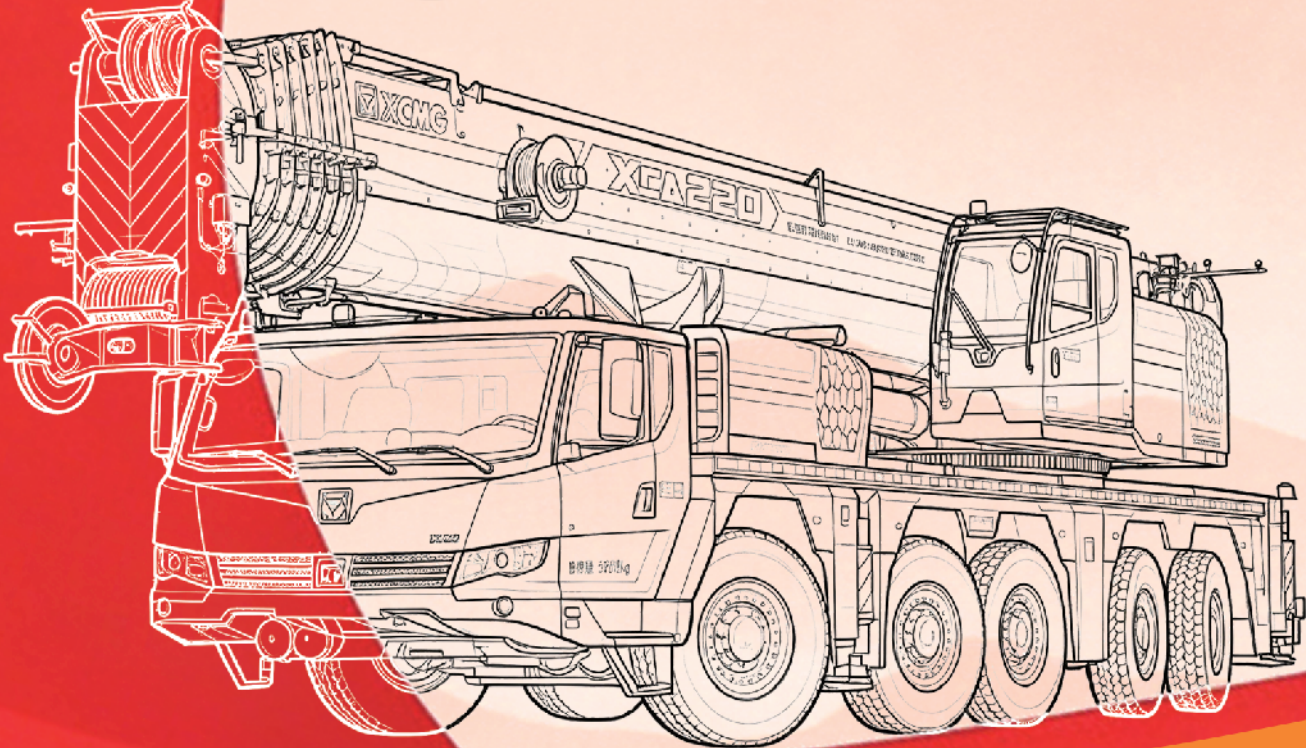
首台

▼1963年3月，完成国家一机部下达的Q51型汽车起重机试制任务，中国首台五吨汽车起重机下线，远销海外。



自研

▲2000年，国内首次自主研发K系列汽车起重机(QY16K、QY25K、QY35K、QY50K)产品，开启了国内起重机系列化自主研发的新篇章。



突破

▲2017年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徐工时乘坐过的XCA220型全地面轮式起重机，该型号起重机被认为是工程机械中技术复杂、研发难度大的产品之一。

开路

1943年建厂至1949年南迁，6年间，华兴铁工厂在战火封锁中，白天生产、夜间作战。没有像样的机器，工人们赤手架炉、昼夜轮班；原料断供，老百姓砸锅卖铁、拆门献铜，能熔的全都熔了弹壳。

带着铁水淬炼的底色，这家从山沟里走出的工厂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。1949年初，工厂迁至新浦。同年，19岁的掌家忠走进厂门，成为一名锻工。那时的他还不知道，自己的命运将从此与这家工厂、与新中国工业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掌家忠铁匠世家出身，从小在炉火旁长大，他对“锻工”的理解，就是一锤一锤地敲打。进了工厂才知道，面前是工业化生产、批量制造、技术革新的全新世界。

边干活边识字，是那个年代工人的日常。没有图纸，靠自己摸索；没有成熟工艺，那就一遍遍试。1953年，徐州实业铁工厂、大力铁工厂与华兴铁工厂三厂合并，掌家忠来到徐州重型机械厂。20世纪50年代，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，国家引进大型农具。1955年，双轮双铧犁的生产任务落到厂里。锻工小组的进度，就是整条生产线的进度。

“党员，就是要在关键时刻顶上去！”压力越大，掌家忠越清醒。他带着组员从改进工具、优化操作入手，33项技术革新，硬是一锤一锤敲了出来。

没有现成设备，就守着锅炉反复琢磨，模具不合适，拆掉重来；参数不对，再试一次……掌家忠常常满脸汗灰，蹲在设备旁一研究就是大半天。

1956年，任务陡增十几倍。他们硬是把效率又提了六七倍。1962年，国家一机部五局将Q51型五吨汽车起重机试制任务交给徐州重型机械厂——国内没有图纸、没有装备、没有先例，一切从零开始。

工程师们自力更生，不到200天就完成攻关。掌家忠的锻工小组也参与其中，最难的时候，大家连轴转，没人说个不字。

1963年3月，中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汽车起重机——“老五吨”试制成功。从无到有，掌家忠见证的是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艰难起步。

“国家需要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”掌家忠常挂在嘴边的话，朴实如铁，却字字千钧。1991年退休时，他已是全国劳模、全国人大代表。但比荣誉更重的，是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——在没有条件的年代，把条件硬生生干出来的人。

如百年前南湖之畔那群人，他们在没有航标的江河上启程，义无反顾。这一代人的信仰，从来就不是选择题——它是命运给出的唯一选项，而他们，给出了毫不犹豫的回答。

1978年12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、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。

对于当时的徐州重型机械厂而言，这是一次从“计划”到“市场”的惊险一跃。

1989年，徐工集团作为集团化改革样板组建。集团领导被派到德国利勃海尔参加技术培训，眼前漆成明黄色的起重机一排排如艺术品，那时利勃海尔已达800吨级，而中国只能生产50吨级。

差距明明白白摆在那里。怎么办？在掌家忠抡锤锻打的同一段岁月里，比他稍晚走进厂门的李宗久，已在起重机调试线上扎下了根。

从“老五吨”起步，到后来执掌出口车间，他的答案清晰而朴素——“追”的办法，从来不是等，是守，是钻。

而此时，市场经济浪潮涌动，有人“下海”，有人观望。李宗久不是没有机会离开，但作为党员，他更清楚自己身上担子；越是困难时期，越需要有人守住阵地。

1992年，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中国的改革开放掀起新的风帆。

这一年，徐工历经艰难争取，拿到行业首家自营出口权。同年，徐工代表中国工程机械企业首次参加

2002年11月，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“走新型工业化道路”。中国制造业被赋予全新使命：不仅要“大”，更要“强”。

这场突围战，徐工没有缺席。李戈，正是这一阶段的参与者与推动者。

1995年，李戈进入徐工重型车间实习，随后主动申请调到更艰苦的调试岗位——风吹日晒，却更接近技术核心。跑现场、学排故、练操作，短短几年便脱颖而出。

2002年，徐工第一次带实车参加德国慕尼黑宝马展。那台尚不成熟的全地面起重机，运输途中发生故障，在去展馆的路口抛了锚。

面对质疑的目光，李戈和团队现场完成修复，坚持把设备开进展区。国外同行钻进车底反复查看——既是好奇，也是审视。

正是这样的刺激，加速了徐工的突破。团队以两年为目标攻克400吨级全地面起重机技术。2006年上海宝马展，七台100吨级至400吨级设备集中亮相，

2017年10月，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。两个月后的12月12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开启党的十九大后首次地方视察，第一站就来到徐工重型，鼓励大家“在为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争取人人出彩”。

嘱托，落在每一位青年党员心里。胡小冬就是其中一员。2009年，这个怀揣“技能报国”梦想的年轻人加入徐工。彼时，国产轮式起重机虽已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，但电液控制等关键技术仍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。

越是“卡脖子”的地方，越需要有人迎难而上。

“核心技术不是等来的，也不是买来的，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试出来。”面对国外长期垄断，胡小冬带领团队扎进试验场和实验室。一次次推倒重来，一轮轮反复验证，历经3年、近千次试验，终于攻克电液核心技术难关，助力中国首台千吨级轮式起重机成功问世。

2017年，当行业竞争进入精细化阶段，胡小冬又将目光投向操控性能这一高端市场的核心指标。他带领团队研发出我国新一代高精度、低能耗起重机电液压系统，使操控精度提升30%、能耗降低20%，推动徐工产品加速进入全球高端市场，改写了国际轮式起重机产业竞争格局。

此后十余年间，在胡小冬和团队持续攻关下，徐工先后7次刷新全球轮式起重机最大吨位纪录，将“全球第一吊”从1200吨提升至4000吨，把中国制造一次次推向新的高度。

2022年10月，党的二十召开。报告明确提出：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，推进新型工业化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、质量强国、航天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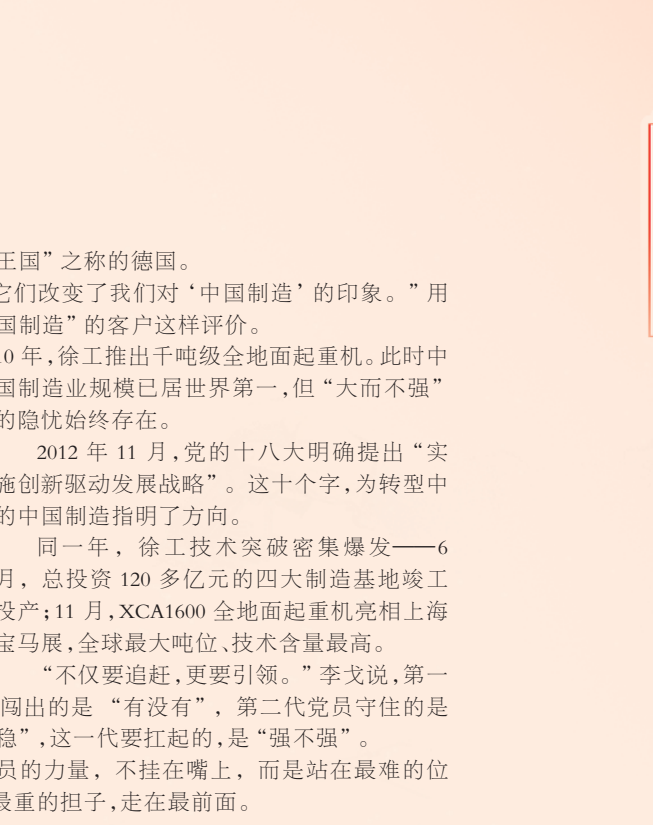
掌家忠



李宗久



李戈



胡小冬

加德国慕尼黑宝马展——9平方米室内展位，几块产品图片展板，几把椅子，没有一件实物。

李宗久回忆：“第一次亮相，寒酸得让人心疼。”迈出第一步，从来不是鲜花坦途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徐工两台16吨汽车起重机出口美国，50多天上展后，客户愤然拒收——油漆剥落，油缸、螺栓锈迹斑斑。

痛定思痛，徐工展开质量大反思，严格对标国际标准，主导产品陆续通过欧盟CE、美国SAE、俄罗斯GOST认证。

“那些年的技术积累，不单是靠一个人扛出来的。”许多年后，李宗久还会时常回想起“老五吨”攻关时的场景：掌家忠蹲在锅炉旁满脸汗灰的身影，和那一锤一锤敲出的执着。

“那是我们这个行当的根。”李宗久说。正是这份精神，支撑着无数共产党员在深夜里守着，在失败中撑着，汇成了徐工从零起步，一寸一寸往前挪的底气。

后来，李宗久的儿子李戈也走进徐工。退休那天，李宗久站在熟悉的车间门口看了很久。“我守了一辈子，接下来的路，你来接。”父亲的这句话，李戈记了很多年。

基础打下来了，真正的超越，要靠下一代完成。

震动行业。

“曾经的轻视逐渐转为尊重。”李戈正是这一转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。

2008年，是李戈人生的转折点。

5月12日，汶川特大地震发生。当天下午，徐工接到救援任务，李戈随队出发。24小时奔波，这支临时组建的救援队赶到了极重灾区德阳。李戈驾驶起重机协助拆除楼板，亲眼看到解放军徒手清理废墟，双手挖到血肉模糊。

“余震来时，危险就在身边，但没人后退。”李戈从灾区回来的第二天，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因为他在废墟上明白了父亲守了一辈子的信念——党员不是身份，是在危险面前，先上一步的人。

李戈重新扎进车间。2008年秋天，徐工自主研发的500吨级全地面起重机完成装配，这是当时国产最大吨位，这一产品进入了欧盟市场，也进入了素有

国、交通强国、网络强国、数字中国。

新时代赋予中国制造新的使命，也赋予这一代产业工人新的考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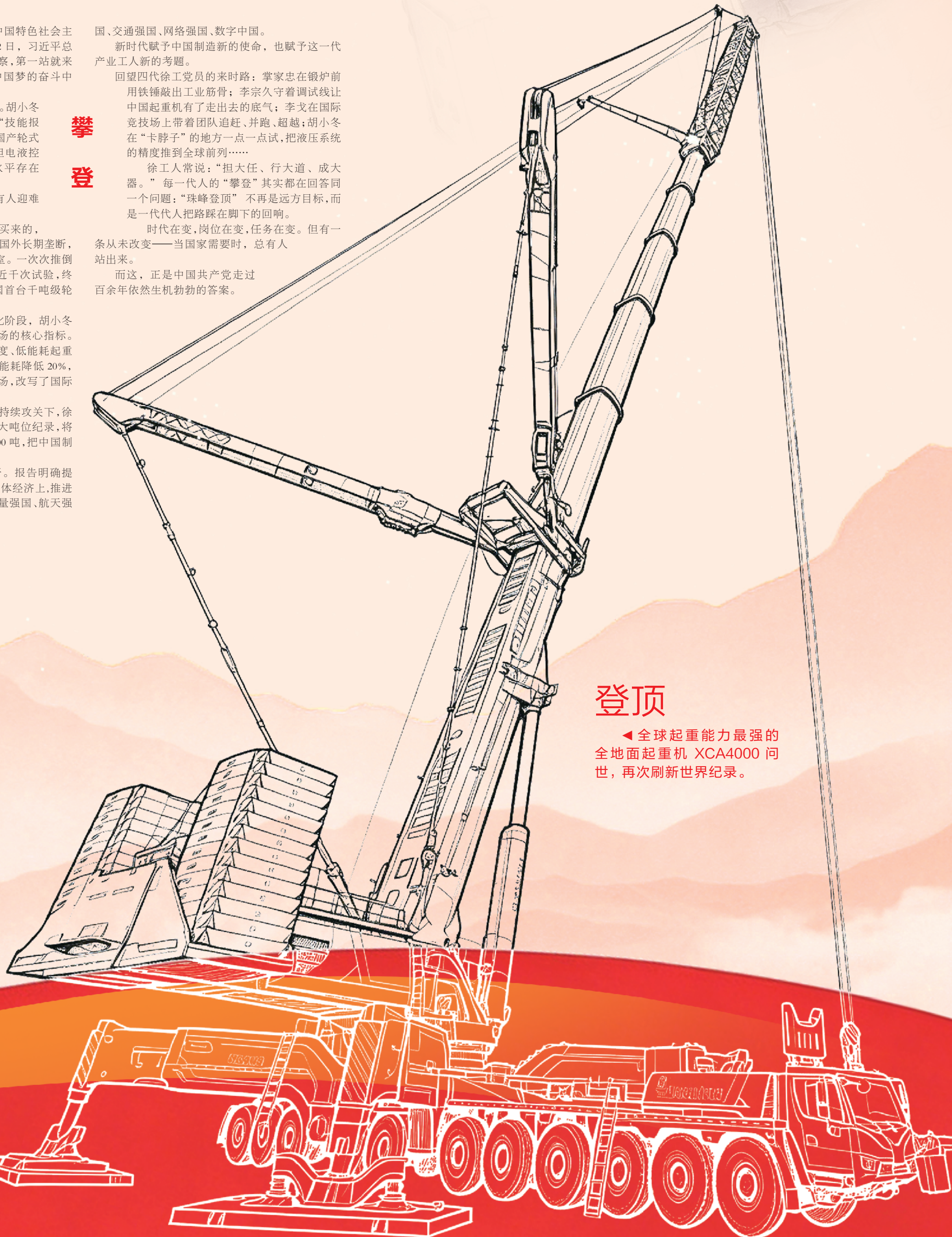
回望四代徐工党员的来时路：掌家忠在锅炉前用铁锤敲出工业筋骨；李宗久守着调试线让中国起重机有了走出去的底气；李戈在国际竞技场带着团队追赶、奔跑、超越；胡小冬在“卡脖子”的地方一点一点试，把液压系统的精度推到全球前列……

徐工人常说：“担大任、行大道、成大器。”每一代人的“攀登”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“珠峰登顶”不再是远方目标，而是一代代人把路踩在脚下的回响。

时代在变，岗位在变，任务在变。但有一条从未改变——当国家需要时，总有人站出来。

而这，正是中国共产党走过百余年依然生机勃勃的答案。

攀登



登顶

▲全球起重能力最强的全地面起重机XCA4000问世，再次刷新世界纪录。